

外群体一定贬损吗：来自蒙古族和汉族群体的证据^{*}

吴云龙¹ 张玉柱^{**1,2}

(¹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2) (²呼和浩特职业学院,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 本研究采用单一复述法考察了我国非冲突性、地位平等的蒙古族和汉族群体, 在面对面传递彼此不同效价的民族刻板印象信息时的群体效应。实验1证明了蒙古族和汉族间表现出的并非“外群体贬损”, 而是“外群体偏爱”。实验2通过考察人际敏感性和群际态度两个变量验证了蒙汉间外群体偏爱的真实性, 但这一效应在群际态度消极的高敏感汉族中表现出了人为增益性; 而且发现了蒙汉族际沟通中的不同信息传递模式, 蒙古族同时着眼于积极和消极信息, 而汉族更偏重于积极信息。由此可知, 外群体并不一定引发贬损, 群体性质兹事体大。

关键词 外群体偏爱 蒙古族和汉族群体 族际信息沟通 人际敏感性 群际态度

1 引言

在现实的人际互动过程中, 人们总是会根据多种多样的特征将人进行内外群体划分, 可以根据性别、民族等自然特征划分, 也可以根据竞争与合作等临时特征构建(赵永萍, 张进辅, 2013)。人们倾向于对内群体作出积极评价, 而对外群体作出消极评价(Sumner, 1906), 这种倾向被分别称为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贬损, 这是最早对内-外群体效应进行概念的阐述。有关外群体贬损最早的实证研究来自Sherif等(1961)的洞穴实验, 实验发现当将资源进行限制并从事竞争性的活动时, 互不认识的两组儿童的冲突与对立便显现。随后Tajfel(1970)采用最简群体实验进一步证明, 利益冲突并不是产生群际冲突和贬损的必要条件, 仅仅是感知到群体分类便足以使被试给内群体成员分配更多资源, 引发对外群体的歧视。其他研究也从不同角度对内-外群体效应进行了验证, 例如, 儿童在基于资源价

值的分配行为上表现出了内群体偏爱(刘璐等, 2019)。

以上对于群体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个体单向的认知评价和行为反应上, 然而群体效应也会出现在人际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传递中。以往传统的认知实验法便不足以在人际沟通中对群体效应进行研究, 而系列再生法可以较好地弥补这一局限, 从信息的动态渐变过程中考察其背后的意义(Xu & Griffiths, 2010)。系列再生法的一般过程为: 请被试a阅读一份实验材料, 然后进行一段时间的记忆干扰, 再请被试a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下一个被试b传递材料。被试b以同样的方式传递给被试c, 依此类推直到最后一个被试传递完。以往为数不多的几个运用系列再生法对群体效应进行探讨的研究仍然证明了外群体贬损的主导性, 如赵永萍和张进辅(2013)通过操纵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来建构内外群体, 证明个体更容易传递外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信息; Kwok等(2007)同样发现了澳大利亚被试向本国听众传递了更多的亚洲人消极刻板印象信息。

* 本研究得到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地专项课题(2019ZJD004)和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CXJB19005)的资助。

** 通讯作者: 张玉柱, E-mail: nsdzyz@163.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10325

虽然许多研究从不同角度验证了外群体贬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其群体特点有着特殊性,如 Sherif 等人(1961)研究中具有资源冲突的竞争性群体,以竞争/合作这一临时特征建构的内外群体(赵永萍,张进辅,2013),即使是 Tajfel(1970)使用的最简群体依然要进行资源分配。那么在其他群体间,如不同的民族间,在不涉及资源分配和竞争条件下的信息传递过程中是否依然会表现出外群体贬损?是否如最简群体实验的观点,仅仅是感知到群体分类就会产生外群体贬损?

由此,本研究以我国的蒙古族和汉族为研究群体,使用系列再生法实验范式,对“外群体是否一定被贬损”这一问题进行回答。一者,将我国的民族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丰富以往研究群体的类型;再者,对最简群体实验的观点进行本土化的检验,提供本土化的发现;三者,把群体效应研究纳入信息沟通和传递框架下,扩展该领域的研究。

2 实验 1

采用系列再生法的特例单一复述法,也就是系列再生法中的第一次复述过程(吕行,钟年,2016),考察蒙汉族际沟通时传递民族刻板印象信息的外群体效应,即传递不同效价的民族刻板印象信息的特点。

2.1 方法

2.1.1 被试

通过线上和线下有偿招募大学生 60 人,其中蒙古族 30 人(男 12 人,女 18 人),汉族 30 人(男 16 人,女 14 人),平均年龄为 21.15 岁。蒙古族被试达到蒙汉语兼通水平。

2.1.2 实验材料

从已有研究中(丁慧芬,2011;朱洁琼,2011)选取关于蒙古族和汉族的民族刻板印象信息,各包含 20 个简短的句子,其中积极和消极信息各 10 个。例如,蒙古族积极刻板印象信息为“蒙古族很直率”,汉族消极刻板印象信息为“汉族人爱斤斤计较”。

为了判断选择的民族刻板印象是否符合对蒙古族、汉族的印象,在研究前,20 名心理学研究生(蒙古族和汉族各 10 名)对所选材料进行了 5 点评分(从 1 不符合到 5 符合),平均分大于 3 即被认为符合对蒙古族、汉族的印象。然后,对材料是积极还是消极的程度进行 5 点评分(从 1 消极到 5 积极),

平均分低于 2 为消极刻板印象、高于 4 为积极刻板印象。本研究中所选民族刻板印象均符合要求。

2.1.3 实验设计

实验为单因素两水平(民族刻板印象效价:积极 vs. 消极)的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积极和消极民族刻板印象信息的再生量。

2.1.4 程序

研究者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告知被试将要参加一个人际沟通实验。首先请被试阅读两遍关于外群体的材料(即蒙古族被试阅读汉族的材料,汉族被试阅读蒙古族的材料),句子会以 7 秒钟一个的速度在电脑上自动随机播放(Jackson & Rose, 2013);随后进行一项 5 分钟的记忆干扰任务(数学运算);最后请被试面对面的将外群体的信息传递给一个同性别外群体听众。听众为研究者事先安排的助理,仅作信息接收者之用,蒙古族男生和女生、汉族男生和女生各 1 名。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研究者记录被试传递的民族刻板印象词汇,传递的积极和消极词汇的数量即为积极和消极民族刻板印象信息的再生量。实验结束后,检验被试是否能正确反馈出听众的民族身份,以及是否理解本实验为人际沟通实验,将能准确反馈并理解实验操作的被试数据纳入分析。

2.2 结果

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汉族被试向蒙古族听众传递的不同效价的蒙古族刻板印象信息差异显著($M = 2.83, SD = 1.51, t(29) = 10.27, p < .001, d = 2.10$),传递的积极信息要多于消极信息($5.53 > 2.70$);同样,蒙古族被试向汉族听众传递的不同效价的汉族刻板印象信息差异显著($M = 2.23, SD = 1.79, t(29) = 6.82, p < .001, d = 1.67$),传递的积极信息多于消极信息($5.03 > 2.80$)。由上述结果可知,无论是蒙古族向汉族传递刻板印象信息,还是汉族向蒙古族传递刻板印象信息,均倾向于传递更多的积极信息,也就是说在蒙汉族际沟通中的群体效应是外群体偏爱。

3 实验 2

实验 1 的结果证明了蒙古族和汉族在传递彼此的民族刻板印象信息时并不是“外群体贬损”,而是“外群体偏爱”。但是这个结果需要进一步验证,因为它可能是由于被试的人际敏感性,出于保护自己的面子,也为了维护对方的脸面、维系人际关系(Brown & Levinson, 1987)而刻意回避了消极

信息的传递。以往对信息一致性的研究就发现,相比于欧裔澳大利亚被试,亚裔澳大利亚被试传递了更多的刻板印象一致性信息(Yeung & Kashima, 2012),因为刻板印象一致性信息被认为更具有社会连通性(Clark & Kashima, 2007)。当然另一方面的是由于被试对外群体有更多的积极印象而表达了真实的态度。个体原有的群际经验会影响其群际态度,例如消极的民族刻板印象会导致消极的群际接触态度(侯玲, 2013),持有消极偏见则更不愿接触异族成员(Sekaquaptewa et al., 2003),个体原有的外群体厌恶感会增加对外群体的消极评价和态度(Hodson et al., 2013),内隐种族偏见会影响白人对黑人的攻击性评价(Payne, 2005),而积极正面的民族刻板印象则会产生积极的态度(庞隽, 毕圣, 2015)。因此实验2将引入群际态度和人际敏感性两个变量,对实验1发现的“外群体偏爱”的真实性作进一步的验证。

3.1 方法

3.1.1 被试

通过线上和线下有偿招募大学生120人,其中蒙古族60人(男29人,女31人),汉族60人(男30人,女30人),平均年龄为21.16岁。蒙古族被试达到蒙汉语兼通水平。

3.1.2 实验材料

民族刻板印象信息:同实验1。

群际态度:要求被试判断上述民族刻板印象信息符合该民族的程度,从1(不符合)到5(符合)进行5点评分。对消极刻板印象信息得分进行反向处理,而后计算各个项目的总分,分数越高表明群际态度越积极。此次测量中蒙古族和汉族被试的Cronbach's α 系数均为.85。

人际敏感性:采用Boyce和Parker(1989)编制的人际敏感性量表中的人际觉知分量表进行测量。该分量表包含7个项目,主要定义了对人际交往的敏感性,例如“我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采用里克特4点计分,从“非常不像我”到“非常像我”计1~4分,总分越高人际敏感性越高。此次测量中蒙古族和汉族样本的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86、.81。

3.1.3 实验设计

实验为2(群际态度:积极 vs. 消极) \times 2(人际敏感性:高 vs. 低) \times 2(民族刻板印象效价:积极 vs. 消极)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民族刻板印象

效价为被试内变量,其他自变量均为被试间变量。因变量为积极和消极民族刻板印象信息的再生量。蒙古族和汉族被试中,分别有13、14人被分配到态度消极—低人际敏感性水平,16、16人被分配到态度消极—高人际敏感性水平,17、16人被分配到态度积极—低人际敏感性水平,14、14人被分配到态度积极—高人际敏感性水平。

3.1.4 程序

程序同实验1,另外当电脑以7秒/个的速度播放句子时,被试需要在此时间内完成阅读的同时对其进行评分,判断材料符合该民族的程度,实验结束后还要完成《人际觉知分量表》。

3.2 结果

根据大于/小于平均数原则(Gillespie et al., 2013)将被试分成群际态度积极/消极组以及人际敏感性高/低组,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自变量分组有效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群际态度积极组的得分显著高于群际态度消极组($M_{汉族积极} = 85.03$, $SD = 2.90$ vs. $M_{汉族消极} = 68.30$, $SD = 5.69$, $t(58) = 14.36$, $p < .001$, $d = 3.70$; $M_{蒙古族积极} = 75.06$, $SD = 7.40$ vs. $M_{蒙古族消极} = 60.07$, $SD = 5.43$, $t(58) = 8.90$, $p < .001$, $d = 2.31$),高人际敏感性组的得分显著高于低人际敏感性组($M_{汉族高} = 22.53$, $SD = 1.96$ vs. $M_{汉族低} = 16.50$, $SD = 2.03$, $t(58) = 11.71$, $p < .001$, $d = 3.02$; $M_{蒙古族高} = 24.33$, $SD = 2.63$ vs. $M_{蒙古族低} = 17.23$, $SD = 2.53$, $t(58) = 10.66$, $p < .001$, $d = 2.75$),说明对自变量的操纵是有效的。

把民族刻板印象效价(积极 vs. 消极)作为被试内因素,把群际态度(积极 vs. 消极)、人际敏感性(高 vs. 低)作为被试间因素进行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汉族被试向蒙古族听众传递蒙古族刻板印象信息时,民族刻板印象效价的主效应显著, $F(1, 56) = 170.23$, $p < .001$, $\eta_p^2 = .75$,积极民族刻板印象比消极民族刻板印象传递的多($4.60 > 1.55$);民族刻板印象效价与人际敏感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56) = 1.47$, $p > .05$, $\eta_p^2 = .03$;民族刻板印象效价与群际态度的交互作用显著(见图1), $F(1, 56) = 16.52$, $p < .001$, $\eta_p^2 = .23$ 。简单效应检验表明:群际态度在积极民族刻板印象上差异显著, $F(1, 58) = 13.13$, $p < .001$, $\eta_p^2 = .18$,即对蒙古族态度积极的汉族被试比态度消极的汉族被试传递了更多蒙古族积极刻板印象信息($5.23 > 3.97$);群际态度在消

极民族刻板印象上差异不显著, $F(1, 58) = 3.49, p > .05, \eta_p^2 = .06$, 说明汉族被试对于蒙古族的态度无论是积极或消极, 其传递的蒙古族消极刻板印象信息一样多。此外, 人际敏感性与群际态度和民族刻板印象效价的三项交互作用显著 (见图 2), $F(1, 56) = 9.70, p < .01, \eta_p^2 = .15$ 。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人际敏感性在积极民族刻板印象—消极群际态度水平上的简单效应显著, $F(1, 56) = 7.43, p < .01, \eta_p^2 = .12$, 意味着当汉族被试对蒙古族的态度消极时, 人际敏感性高的被试比敏感性低的被试传递更多的蒙古族积极刻板印象信息 ($4.56 > 3.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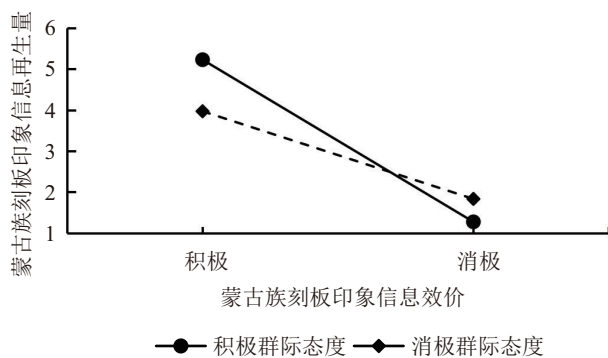


图1 蒙古族刻板印象信息效价与群际态度的交互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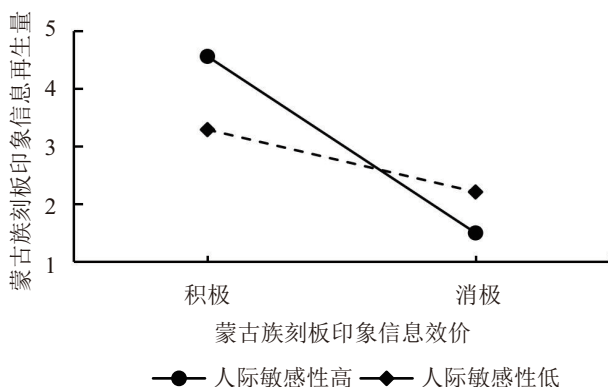


图2 群际态度消极时蒙古族刻板印象信息效价与群际态度的交互作用

(2) 蒙古族被试向汉族听众传递汉族刻板印象信息时, 民族刻板印象效价的主效应显著, $F(1, 56) = 133.02, p < .001, \eta_p^2 = .70$, 积极民族刻板印象比消极民族刻板印象传递的多 ($4.30 > 1.85$); 民族刻板印象效价与人际敏感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56) = .87, p > .05, \eta_p^2 = .02$; 民族刻板印象效价与群际态度的交互作用显著 (见图 3), $F(1, 56) = 33.94, p < .001, \eta_p^2 = .38$ 。简单效应检验表明: 群际态度在积极民族刻板印象上差异显著, $F(1, 58) = 7.82, p < .01, \eta_p^2 = .12$, 说明对汉族态度积极的蒙古族被试比态度消极的蒙古族被试传递了更多汉族积极刻板印象信息 ($4.71 > 3.86$); 群际态度在消

极民族刻板印象上差异也显著, $F(1, 58) = 26.06, p < .001, \eta_p^2 = .31$, 即对汉族态度积极的蒙古族被试比态度消极的蒙古族被试传递了更少汉族消极刻板印象信息 ($1.06 < 2.69$)。另外, 人际敏感性与群际态度和民族刻板印象效价的三项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56) < .01, p > .05, \eta_p^2 < .0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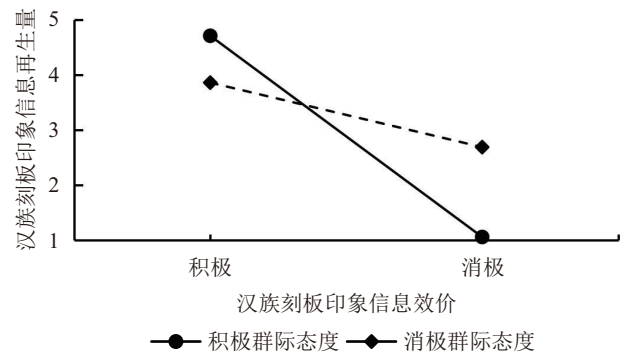


图3 汉族刻板印象信息效价与群际态度的交互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单一复述法, 以我国蒙古族和汉族为群体划分, 考察了二者面对面口头传递彼此不同效价的民族刻板印象信息的特点, 并回答了“外群体是否一定被贬损”这一问题。

实验1结果表明, 与以往的“外群体贬损”不同, 本研究中蒙汉群体间表现出的是“外群体偏爱”。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与群体性质关系重大, 正如引言所述, 以往研究所采用的群体有其特殊性, 群体间的竞争性、冲突性是产生外群体贬损的潜在内因; 另外, 虽然有些前人研究证明了外群体偏爱的存在, 但被试群体也有其特殊性, 群体间存在着高地位/低地位、优势/劣势的差异, 外群体偏爱主要存在于低地位群体中 (陈世平, 崔鑫, 2015)。例如, 较早的洋娃娃偏好实验, 让黑人儿童在白人洋娃娃和黑人洋娃娃中进行选择, 结果发现, 黑人儿童更多地选择白人洋娃娃玩具, 并认为白人洋娃娃比黑人洋娃娃更好 (Banks, 1976); 处于低地位的农村大学生在提取高地位的城市群体积极特质词时, 比消极特质词的无意识加工更显著 (向玲, 赵玉芳, 2013); 对高地位者表现出外显偏好的黑人儿童对白人有明显的内隐偏爱 (Newheiser et al., 2014)。而本研究选取的蒙古族和汉族群体并无上述特点, 群体间是非冲突性、非竞争性、地位平等的。蒙古族和汉族虽属于两个民族群体, 但同属于上位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经过接触、联结和融合, 形成

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是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费孝通，1999）。蒙古族和汉族近代以来，两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结下了深厚的兄弟关系（邢亦尘，1987）。实证研究也表明，内蒙古地区居民对于全国和本地的民族关系非常满意（赵茜，2015），蒙汉大学生人际关系整体水平较好（李敏，戈兆娇，2017）。这是以往研究群体所不能比拟的，也是本研究中“外群体偏爱”的重要原因。这是对以往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最简群体实验（Tajfel, 1970）的观点进行了本土化检验，结果证明感知到群体分类不一定产生外群体贬损。

为了检验蒙汉间外群体偏爱的真实性，实验2又考察了群际态度和人际敏感性两个变量，下面对研究结果作进一步分析。结果发现，无论在蒙古族被试还是汉族被试中，群际态度与民族刻板印象效价的交互作用是显著的，表明群际态度确实对被试传递信息产生了影响，但蒙古族和汉族又有些不同。具体来说，在汉族被试中，群际态度只对积极民族刻板印象信息的传递起作用，而未在消极民族刻板印象信息的传递中起作用。也就是说汉族被试对蒙古族的态度越积极，其传递的蒙古族积极信息越多；但是，即使汉族被试对蒙古族的态度越消极，其传递的蒙古族消极信息却并未显著增加，而只是减少了传递的积极信息。另一方面，在蒙古族被试中，群际态度同时对积极和消极民族刻板印象信息的传递起作用。这意味着，蒙古族被试对汉族的态度越消极，不仅传递的汉族积极信息越少，而且消极信息也会增多；反之亦然，蒙古族被试对汉族的态度越积极，在传递更多的汉族积极信息的同时，传递的消极信息也会减少。从上述差异可以看出，在族际沟通中，蒙古族和汉族有不同的信息传递模式，蒙古族同时着眼于积极和消极信息，而汉族更偏重于积极信息。对这一结果可以通过引入人际敏感性得到更好的理解。

当将人际敏感性引入分析时会得到更深入的结果。在汉族被试中，虽然人际敏感性与民族刻板印象效价的二项交互作用不显著，但在加入群际态度之后发现了显著的三项交互作用，即当且仅当被试对蒙古族的态度消极时，人际敏感性才会发挥作用，

敏感性越高传递的蒙古族积极刻板印象信息越多。但是，在蒙古族被试中，无论是二项交互还是三项交互，人际敏感性均不会对信息传递产生影响，这意味着蒙古族被试在族际沟通中表现出的外群体偏爱完全是其群际态度的真实反映。对二者间差异的可能解释有：其一，汉族受到更多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比如孔子的“和为贵”，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在面对面的沟通中，面子问题也制约着人际互动（赵昌平，2010）；另外，汉族的自我构念倾向于集体主义的互依型自我构念（七十三等，2017），基于以上原因汉族被试可能会更注意人际和谐。所以即使汉族被试对蒙古族持有消极的态度，高敏感性的被试依然会通过传递更多的积极信息以保护面子、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其二，蒙古族的自我构念虽受到主流文化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但有研究指出蒙古族大学生自我构念偏向为个体主义的独立型自我（李杰等，2013），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下是通过信息的准确性来维系人际关系的（Yeung & Kashima, 2012）。因此，人际敏感性未在本实验的蒙古族被试中发挥作用，其只是准确、清晰的传递了信息。

综上，本研究通过我国地位平等、关系和谐的民族群体证明了，蒙古族和汉族在族际沟通中表现出的是“外群体偏爱”，丰富了以往采用具有竞争性、冲突性、具有地位差异性的群体得出的结果，同时也对最简群体实验的观点进行了本土化的检验。另外，本研究还发现了蒙汉族际沟通中的不同信息传递模式，蒙古族同时着眼于积极和消极信息，而汉族更偏重于积极信息；而且，蒙汉间外群体偏爱的真实性得到了证明，但这一效应在群际态度消极的高敏感汉族中表现出了人为增强性。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本研究采用的被试为大学生，大学生的群体特点与其他群体不尽相同，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在其他被试群体中进行验证；二是本研究未考察被试以往的群际接触经历，接触程度不同其群际认知、态度也会有所差异，这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考察。

参考文献

- 陈世平，崔鑫. (2015). 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看内外群体偏爱的发展. *心理与行为研究*, 13(3), 422-427.
- 丁慧芬. (2011). 蒙汉大学生民族刻板印象的结构及差异研究. 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呼和浩特.
- 费孝通. (1999).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侯玲. (2013). 民族刻板印象及其在族际互动过程中的作用.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 李杰, 纪丽君, 武萍, 田颖, 包呼格吉乐图. (2013). 蒙古族大学生自我概念文化启动效应的不对称性.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2(6), 164-167.
- 李敏, 戈兆妍. (2017). 蒙汉大学生人际关系、社会支持和人际信任关系探讨. *民族教育研究*, 28(2), 38-44.
- 刘璐, 肖雪, 刘丽莎, 徐良苑, 张旭然, 李燕芳. (2019). 儿童在不同卷入情境下基于资源价值的分配行为特点：内群体偏爱的作用. *心理学报*, 51(5), 584-597.
- 吕行, 钟年. (2016). 性别刻板印象的人际传播特点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或社会支配理论? *心理科学*, 39(1), 185-190.
- 庞隽, 毕圣. (2015). 广告诉求 - 品牌来源国刻板印象匹配度对品牌态度的影响机制. *心理学报*, 47(3), 406-416.
- 七十三, 何虎, 李杰, 田颖, 刘兴宇, 张瑞芳. (2017). 蒙、汉大学生的自我概念对知觉加工的影响. *心理科学*, 40(3), 645-650.
- 向玲, 赵玉芳. (2013). 使用加工分离程序对低地位群体内 / 外群体偏爱的研究. *心理科学*, 36(3), 702-705.
- 邢亦尘. (1987). 蒙汉各族人民思想文化交流的新时期. *内蒙古社会科学*, 6, 41-46.
- 赵昌平. (2010). 中国人爱面子的进化心理学分析. *心理学探新*, 30(5), 20-23.
- 赵茜. (2015). 内蒙古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现状调查. *广西民族研究*, 2, 40-49.
- 赵永萍, 张进辅. (2013). 群体关系对不同效价的刻板印象信息传递的影响：系列再生法的证据. *心理科学*, 36(3), 688-695.
- 朱洁琼. (2011). 大学生群体的民族刻板印象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 Banks, W. C. (1976). White preference in Blacks: A paradigm in search of a phenomen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3(6), 1179-1186.
- Brown, P., & Levinson, S. 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yce, P., & Parker, G. (1989). Development of a scale to measur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23(3), 341-351.
- Clark, A. E., & Kashima, Y. (2007). Stereotypes help people connect with others in the community: A situate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stereotype consistency bias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6), 1028-1039.
- Gillespie, S. M., Mitchell, I. J., Johnson, I., Dawson, E., & Beech, A. R. (2013). Exaggerated intergroup bias in economical decision making games: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psychopathic traits. *PLoS ONE*, 8(8), e69565.
- Hodson, G., Choma, B. L., Boisvert, J., Hafer, C. L., Macinnis, C. C., & Costello, K. (2013). The role of intergroup disgust in predicting negative outgroup evalu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2), 195-205.
- Jackson, J. W., & Rose, J. (2013). The stereotype consistency effect is moderated by group membership and trait valenc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3(1), 51-61.
- Kwok, W. W., Wright, B., & Kashima, Y. (2007). Constructing intergroup relationships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49(2), 121-135.
- Newheiser, A. K., Dunham, Y., Merrill, A., Hoosain, L., & Olson, K. R. (2014). Preference for high status predicts implicit outgroup bias among children from low-status group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0(4), 1081-1090.
- Payne, B. K. (2005). Conceptualizing control in social cognition: How executive functioning mod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automatic stereotyp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9(4), 488-503.
- Sekaquaptewa, D., Espinoza, P., Thompson, M., Vargas, P., & von Hippel, W. (2003). Stereotypic explanatory bias: Implicit stereotyping as a predictor of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9(1), 75-82.
- Sherif, M., Harvey, O. J., White, B. J., Hood, W. R., & Sherif, C. W. (1961). *Inter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Book Exchange.
- Sumner, W. G. (1906). *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 Tajfel, H. (1970). Experiments in intergroup discrimin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223(5), 96-102.
- Tam, T., Hewstone, M., Kenworthy, J. B., Cairns, E., Marinetti, C., Geddes, L., & Parkinson, B. (2008). Postconflict reconciliation: Intergroup forgiveness and implicit biases in Northern Ireland.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4(2), 303-320.
- Xu, J., & Griffiths, T. L. (2010). A ration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memory biases on serial reproduction. *Cognitive Psychology*, 60(2), 107-126.
- Yeung, V. W. L., & Kashima, Y. (2012). Culture and stereotype communication: Are people from Eastern cultures more stereotypical i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3(3), 446-463.

Is Outgroup Bound to Be Derogated: Evidence from Mongolian and Han Ethnic Groups

Wu Yunlong¹, Zhang Yuzhu^{1,2}

(¹ 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² Hohhot Vocational College, Hohhot, 010051)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great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intergroup attitude and behavior. The dominance of outgroup derogation has been confirmed by many studies. 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proves that opposed group interests in obtaining scarce resources causes outgroup derogation. While Minimal-Group experiment demonstrates that social categorization is enough to trigger derogation behavior. In addition, outgroup derogation is found in religious groups. However, intergroup attitude and behavior can also appear in interpersonal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ransmission, which has been rarely discuss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only two studies have also confirmed the dominance of outgroup derogation. Nonetheless, these groups have specific features. For example, two competitive groups with resource conflict in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in Northern Ireland with sectarian conflict. The competitive and conflicting features of these groups may be the potential internal cause of outgroup derogation. Therefore, do the groups without such characteristics still show the effect of outgroup derogation? Based on this, the current study took non-conflicting and non-competitive Mongolian and Han ethnic groups as the study group and used Single Reiteration Paradigm to answer the question “Is outgroup bound to be derogated?”.

The current study conducted 2 experiments. The first experiment was a single-factor within-subject design with information valence (positive vs. negative)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transmi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outgroup to a same-sex outgroup audience face to face. The second experiment employed a 2 (intergroup attitude: positive vs. negative) \times 2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high vs. low) \times 2 (valence: positive vs. negative) mixed design with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intergroup attitude as between-subjects variables.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4 groups by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intergroup attitude scores and asked to transmit the outgroup information like in experiment on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Mongolian and Han ethnic groups both transmitted more positive information about each other. (2) In the Han group, participants with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Mongolians transmitted more positive stereotype information than those with negative attitude. When participants had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Mongolians, those with high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transmitted more positive stereotype information than those with low sensitivity. (3) In the Mongolian group, participants with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Han transmitted more positive stereotype information and less negative stereotype information than those with negative attitude.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Mongolian and Han ethnic groups displayed “outgroup favoritism” rather than “outgroup derogation”. The authenticity of outgroup favoritism between Mongolians and Han was verified by testing the impacts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intergroup attitude. However, this effect showed a beneficial artificial enhancement in the highly sensitive Han with negative intergroup attitude. Moreover, different pattern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were found in the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Mongolian and Han ethnic groups. Mongolians focus o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while Han pay more attention to positive inform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outgroup is not bound to be derogated, and the nature of the group matters.

Key words outgroup favoritism, Mongolian and Han ethnic groups, interethnic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ntergroup attitude